

从“子民”到“国民”:观念转换与意义阐释

——以陈子褒编撰新式妇孺教科书为中心

吴小鸥

【摘要】 1895年之后,陈子褒开始编撰新式妇孺教科书,陆续出现“子民”“国民”“女国民”“国家之母”等内容,建构以“国家”为核心的国民观。这些教科书从“天下国家”到“国民国家”,强调“国民”与“国家”同构,“国权”与“人权”统一;从“半教立国”到“女子读书”,倡导“造就平等之智识”,明确“以学救愚”“以教育兴国”;从“仁者爱人”到“一样亲爱”,呼吁“我国民,要相亲”,排列“爱国”“爱人”“爱己”顺序。陈子褒以“妇孺之仆”的实在努力,开创性建构及多样表达国民观,折射出近代知识分子的现代国家想象,彰显了新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创生的过程,也诠释了新式教科书承载的时代精神,为中国教育启蒙现代“人”开辟了重要道路。

【关键词】 陈子褒;新式妇孺教科书;子民;国民

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意义,“民为邦本”思想源远流长。“民”通常指不具备官方身份的人,如“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穀梁传·成公元年》),其实质是政治性的集合概念,是在“君—民”或“官—民”的政治等级框架下来界定的。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文化本质,自周代实施宗法分封制,“父子”家庭伦理关系对“君民”政治关系的同化,将血缘角色认定自觉等同于政治角色认定,有“为民父母”“爱民如子”等话语表达,衍生出“子民”一词,如“君天下,生无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子爱,有忠利之教”(《礼记·表记》)。“国民”一词在中国最早见于“先神命之,国民信之”(《左传·昭公十三年》),^①其涵义一指外国人,^②二指“国”与“民”。^③甲午战败,康有为指出“值四千年之变局”,^④强调“夫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⑤1896年,梁启超在《文明日本报》之《中国论》一文中采用“国民”一词。^⑥1898年康有为多次

吴小鸥,教育博士,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宁波 315211)。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百年中国教科书中的国民性建构研究”(BOA170039)的研究成果之一。

① 吾淳:《中国哲学的起源:前诸子时期观念、概念、思想的发生发展与成型的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45页。

② 如“国民经营希利,算悉锱铢,亦多情普济之意。”参见魏源:《海国图志》第16卷,1843年,第1667页。

③ 如“而小钱禁令既严,制钱短少更甚,实于国民生计大有关。”参见:吕佺孙:《请改铸钱钱疏》,《皇清道咸同光奏议》第38卷,1854年,第2050页。

④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一九〇五年五月二日),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17页。

⑤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一九〇五年五月二日),第131页。

⑥ 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III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5年,第276页。

使用“国民”一词,提出创立“国民学”以“鼓荡国民,振励维新”。^①1899年,梁启超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中对“国民”进行了较为完整的描述,影响很大。陈子褒是康门弟子,与“启超、启勋为同学”。^②他先后在广州、澳门、香港等地创办新式学塾(校)三十余年,“独其对于国民教育,纵心孤往,为全国倡,则真冠绝一时,为东方之斐斯塔若籍也。”^③陈子褒自称“妇孺之仆”,^④从1895年开始编撰出版以“妇孺”冠名的新式教科书,陆续出现“子民”“国民”“女国民”“国家之母”等内容。陈子褒怎样选择和呈现相关的知识?希望传承和嬗递哪些价值取向的观念?如何阐释救亡图存时代教育启蒙之革新意义?……本文试初步分析之,以求教于方家。

一、陈子褒及其新式妇孺教科书

陈子褒(1862—1922),名荣袞,号耐庵,广东新会外海人,早年“奕奕有文名”。^⑤1878年中秀才,“年十六,补邑庠生,旋以高等食廪饩,授徒会城。”^⑥1893年,陈子褒“乡举第五人,与康南海先生同榜”。^⑦他读了康有为的试文《书同文》之后,认为虽“名列南海康有为之前,但读其文,自谓不及”,^⑧于是“即执贽万木草堂称弟子”。^⑨1895年,陈子褒参与“公车上书”,积极投入“专为中国自强而立”^⑩的强学会,希望“聚天下之图书器物,集天下之心思耳目,……以广见闻而开风气,上以广先圣孔子之教,下以成国家有用之才”。^⑪为女子启蒙教育,“君于光绪乙未以前,已著妇孺须知一书”,^⑫用于自己的教学实践,时人称之为改革启蒙课本之先驱。1895年底,以“妇孺”冠名的《妇孺须知》《妇孺浅解》等新式教科书开始出版。

1898年,陈子褒加入康有为倡立“以图保全国地、国民、国教”^⑬的保国会,但戊戌政变失败,“先生亦以康门关系,同被通缉”,^⑭于是“仓皇东渡”。在日本,陈子褒对福泽谕吉的庆应义塾尤为称赞,指出中国“诸贤皆眼光向上,而忽根本之图,徒劳而无功”。^⑮回国后,他致力于童蒙教育改革,先在开平县“邓氏私塾”任教习,后设蒙学书塾(后改为灌根学塾)于澳门。1903年,灌根学塾首次兼收女生,“是澳门华籍女童接受学校教育之始,也是澳门华人男女同校之始。”^⑯1907年后,陈子褒陆续创办佩根女义塾等,积极推行女子教育与平民教育。1918年,蒙学书塾“迁校香港,从游者愈增,合男女之数,恒岁二三百人”,^⑰成为当时“香港最具规模的学校”。^⑱1919年后,陈子褒创办联爱女校、圣士提反女

①康有为:《请开学校折》(一八九八年六—七月),《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305页。

②《陈荣袞》,许衍董总编撰,汪宗衍、吴天任参阅:《广东文征续篇》(第1册),广州:广东文征编印委员会,1986年,第249页。

③杨寿昌:《陈子褒先生遗集序》,陈子褒著,欧郎若、冼玉清、陈德云编校,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1辑)教育遗议》,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3年,第2页。

④陈子褒:《序》,《妇孺信札材料》,1903年,第1页。

⑤《陈荣袞》,许衍董总编撰,汪宗衍、吴天任参阅:《广东文征续篇》(第1册),第249页。

⑥崔师贯:《陈子褒先生行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1辑)教育遗议》,第4页。

⑦崔师贯:《陈子褒先生行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1辑)教育遗议》,第4页。

⑧《陈荣袞》,许衍董总编撰,汪宗衍、吴天任参阅:《广东文征续篇》(第1册),第249页。

⑨《陈荣袞》,许衍董总编撰,汪宗衍、吴天任参阅:《广东文征续篇》(第1册),第249页。

⑩《上海强学会章程》,康有为撰,姜义华等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96页。

⑪《上海强学会章程》,康有为撰,姜义华等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196页。

⑫杨寿昌:《陈子褒先生遗集序》,陈子褒著,欧郎若、冼玉清、陈德云编校,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1辑)教育遗议》,第1页。

⑬康有为:《保国会章程》,《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33页。

⑭陈察吾:《陈子褒先生行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12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24页。

⑮崔师贯:《陈子褒先生行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1辑)教育遗议》,第4页。

⑯冯增俊:《澳门教育概论》,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6页。

⑰崔师贯:《陈子褒先生行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1辑)教育遗议》,第5页。

⑱王齐乐:《香港中文教育发展史》,香港:三联书店,1996年,第213页。

义学、子褒女校,强调“女子者,国民之母也,女学者,幼学之母也”。^①

陈子褒一生“提倡蒙学,矻矻不倦”,^②以求“救国之要在是矣”。^③他认为儿童成长过程中家庭教育至关重要,“又以学校教育,必本于家庭,妇女不识字者居多数,亟倡女学,期造就平等之智识。凡苦心经营,关于妇孺者尤至”,^④明确指出“女子可造者,未尝逊于男子一筹也”。^⑤初步统计,陈子褒编撰出版以“妇孺”命名的新式教科书二十种,即《妇孺须知》(1895年)、《妇孺浅解》(1896年)、《妇孺八劝》(1896年)、《妇孺入门书》(1896年)、《妇孺三字书》(1900年)、《妇孺四字书》(1900年)、《妇孺五字书》(1900年)、《妇孺新读本》(1900年)、《妇孺论说入门》(1900年)、《妇孺女儿三字书》(1900年)、《妇孺学约》(1901年)、《妇孺论说大观》(1902年)、《妇孺论说阶梯》(1902年)、《妇孺中国舆地略》(1902年)、《妇孺释词粤语解》(1902年)、《妇孺译文》(1903年)、《妇孺信札材料》(1903年)、《妇孺译文》(1904年)、《妇孺闲话》(1905年)、《妇孺中国史问题》(1905年)。这些新式妇孺教科书出版后很受欢迎且不断修订,冠以“一次改良”“二次改良”“三次改良”等多种版本,也有《妇孺三字四字五字书》等合集出版,至民国中后期仍广为流传。

二、新式妇孺教科书呈现“子民”与“国民”

1895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康有为指出,“非经甲午之役,割台偿款,创巨痛深,未有肯翻然而改者”,^⑥并且呼吁“时事多艰,人才孔亟,期与海内贤能力矢自强。”^⑦严复指出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人”的问题,“溯源竟委,发明富强之事,造端于民,以智、德、力三者为之根本”。^⑧陈子褒为开启民智编撰新式妇孺教科书,“今日编书宜为极贫极愚之国民,设法乃为有补大局。”^⑨

(一) 1895—1896年,《妇孺须知》《妇孺浅解》中闪现“子民”一词。

《妇孺须知》是陈子褒编撰的第一本新式妇孺教科书,内容为分类识字。全书将生字分为天文类、时令类、人伦类、草木类、宫室类、珍宝类、器用类等依次编排,每一类有若干字及其阐释,如“天文类”列有“天、雷、风、云、霜、烟、星、雨、雾……”^⑩“人伦类”列有“王、民、亲、军、相、师、帝、官、友、君……”^⑪这些生字大字印刷,右下方为小字编排的词语,如“天”字有“天地”,“王”字有“大王”,“民”字有“子民”。^⑫1896年,陈子褒将《妇孺须知》增加粤语口语阐释,编排时将原内容前置,增加的内容后置,冠以《妇孺浅解》出版。在《妇孺浅解》之“人伦类”,“民”字相关词语仍为“子民”,^⑬但在用粤语口语阐释的部分,则改为“人类”,列有“父、母、兄、伯”等内容。^⑭1901年,陈子褒改良《妇孺须知》,《妇孺浅解》也进行了新刻,“子民”一词则不再出现。《妇孺须知》《妇孺浅解》是笔者目前发现出现“子民”的两种新式教科书,呈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尊卑秩序共同体是以血缘、准血缘或拟

①陈子褒:《联爱女生招生启》,《教育遗议》,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163—167页。

②方美贤:《香港早期教育发展史》,中国学社,1975年,第177页。

③崔师贯:《陈子褒先生行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1辑》教育遗议,第4页。

④崔师贯:《陈子褒先生行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1辑》教育遗议,第4页。

⑤陈子褒:《教育女子论》,《教育遗议》,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108—109页。

⑥康有为:《京师保国会第一集演说》(一八九八年四月十七日),《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38页。

⑦康有为:《殷试策》(一八九五年春),《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06页。

⑧严复:《与梁启超书》,卢云昆编:《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严复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521页。

⑨澳门蒙学书塾编辑:《改良妇孺须知》上卷,广州:省城实学书局,1903年初版,例言。

⑩《妇孺须知》,粤东文光楼藏板,1900年新编,第1页。

⑪《妇孺须知》,第4页。

⑫《妇孺须知》,第4页。

⑬《妇孺浅解》,粤东鸿都阁藏板,1897年新编,第4页。

⑭《妇孺浅解》,第8页。

血缘来加以维系的思想。

（二）1900—1901年，《妇孺新读本》以及“改良”妇孺新式教科书中呈现“国民”“女国民”“国家之母”等内容。

在西方，“民”也是政治文化的核心概念，“民”的内涵即是“公民”（citizen），是现代的法治主体，是建构现代国家的阐释要点。“日本学者池上荣子研究明治初期日本的公民权与国族认同，指出，明治日本在吸纳西方政治观念时，并没有将citizenship和citizen译作‘市民权’与‘市民’，而是将之译作‘国民’。这种语意上的偏移，透露出近代日本的国民建构，未尝以一个相应的‘市民社会’为基础，而是与其国族打造的历史进程紧密相关。”^①1899年10月15日，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撰写著名的《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一文指出，“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二字并称者，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②并对“国民”进行了重要的界定，“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③1900年，陈子褒编撰《妇孺新读本》八卷，“国民”一词首次出现在课文标题中，如卷六有《国民读书》一课，“凡有教化之国，其民必读书识字。教化愈盛，则读书识字之人愈多，而国愈强。……”^④（此课文与1899年版南洋公学《蒙学课本》卷1《第五十一课》内容一样）。^⑤1901年，陈子褒在《改良妇孺须知》“例言”中多次出现“国民”一词，如“国势之弱由於国民之智不开，如雷公电母雨师风伯等名称，乃窒塞民智之尤者。……神怪乃孔子所不语，为其窒塞国民之智慧也。”^⑥特别重要的是，陈子褒将“人伦类”改为“人类”，没有出现单独“民”字，^⑦并将“王”的位置后移，词语仍为“大王”。^⑧1901年，陈子褒在《改良妇孺三字书》（《妇孺三字书》于1900年初版）增加《女儿三字书》《爱国三字书》，出现“尔女子，亦国民”^⑨。同年，陈子褒将《妇孺论说入门》（1900年初版）进行改良，在《改良妇孺论说第二种》中出现《国民论》一课，阐释“我之国民”^⑩思想，在《中国不兴女学之弊论》一课中对“我中国四万万同胞之中，有二万万不学之女子焉”^⑪十分担忧，倡导“女子读书”，^⑫并展现外国已经形成“女子小学、女子大学、女子师范学校……彼女子将为国家之母也”，^⑬展现全新的女子角色期待并赋予其神圣的责任。

三、新式妇孺教科书对国民观之建构

国民观是清末知识分子在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下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时对一国之民应该具有的

①沈松桥：《国权与民权：晚清的“国民”论述，1895—1911》，（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言语研究所集刊》第73本第4分册，2002年，第675页。

②③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1899年10月15日），饮冰室主人编辑：《中国魂》，上海：广智书局，1911年，第67页。

④《妇孺新读本》卷6，明经阁藏板，1900年，第16页。

⑤《蒙学课本》卷1，上海：南洋公学，1899年第2次排印，第15页。

⑥澳门蒙学书塾编辑：《改良妇孺须知》上卷，广州：省城实学书局，1903年初版，例言。

⑦陈子褒将“人伦类”改为“人类”，上卷列有“人、男、女、爹、爸、妈、姐、公、婆、姑、伯、叔、哥、姊、妹、婢、姆、仔、侄、你、我、先生、学生”，下卷列有“祖、父、母、孙、友、朋、舅、甥、婿、姨、姪、姪、爷、娘、奶、太、后、媒、郎、将、兵、官、医、匠、差、夫、徒、主、客、王、妃、蛋、苗、黎、番、贼、仇、讎、众、谁、己、自、尸、冤、鬼、神、皇帝、圣人、元帅、老师、亲戚、老表、艄公、师傅、少爷、小姐、夥计、伙头、乞儿、太监”。

⑧澳门蒙学书塾编辑：《（改良）妇孺须知》下卷，广州：省城实学书局印发，1903年初版，第24页。

⑨《改良妇孺三字书》下卷，英文堂书局，1901年3版，第1页。

⑩蒙学书塾编辑：《（初次改良）妇孺论说入门》，1901年再版，第22页。

⑪蒙学书塾编辑：《（初次改良）妇孺论说入门》，第22页，第16页。

⑫蒙学书塾编辑：《（初次改良）妇孺论说入门》，第22页，第16页。

⑬蒙学书塾编辑：《（初次改良）妇孺论说入门》，第22页，第16页。

特质作出的思考。^①国民观是伴随着子民观的瓦解和新国家观念的确立而逐渐建构的。陈子褒被誉为“维新之塾师”，^②在新式妇孺教科书中从国家观、教育观、德行观三方面积极建构国民观。

（一）从“天下国家”到“国民国家”：强调“国民”与“国家”同构，“国权”与“人权”统一。

“国家”一词早见于《周易》^③、《尚书》^④，通常指不同的统治区域。夏、商、周已属于早期国家性质，标志是“家天下”，^⑤如“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在这一语境中，“天子统治的国家叫做天下，诸侯统治的国家叫做国，卿大夫统治的国家叫做家。”^⑥“国家”有时也指天下、邦国、家室之总称，如“国家将兴，必有祚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中庸》）。从秦汉开始，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编户齐民的范围扩展到皇帝统治“天下”，“中国完成从早期国家向成熟国家的国家形态转变时期，也是‘天下国家观’确立的重要时期。”^⑦伴随着近代重大历史变故，亡国与亡天下危机并起，天下国家观不断被探讨与关注。1884年，康有为在《礼运注》中指出，“夫天下国家者，为天下国家之人公共同有之器，非一家所得私有。……故只有天下为公，一切皆本公理而已。公者，人人如一之谓，无贵贱之分，无贫富之等，无人种之殊，无男女之分。”^⑧康有为不仅质疑天下国家观之私有本质，提出国家为人人公有且人人平等的现代思想。陈子褒在新式妇孺教科书中指出“民弱则国弱，国弱则外国侮之，而国必亡”^⑨，积极建构“国民”对“国家”的意义及认同，如《国民论》一课写道：“呜呼，国之存亡，种之盛衰，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彼东西国之何以淳然日兴，我中国何以岌然日危。彼其国民，以国为己之国，以国事为己事，以国权为己权，以国耻为己耻，以国荣为己荣。我之国民，以国为君相之国，其事其权其荣其耻，皆视为度外之事。呜呼，不有民，何有国；不有国，何有民；民与国，一而二，二而一也。今我民不以国为己之国，人人不自有其国，斯国亡矣。国亡而人权亡，而人道之苦，将不可问矣。泰西人曰，中国人无爱国之性质，呜呼，我四万万同胞之民，其重念此言哉，其一雪此言哉。”^⑩

陈子褒首先将天人相与的宇宙论基础上的天下国家观除魅，明确“天命”不再是自明的终极性依据，“人事”才是国家存亡之决定性的因素，进而阐释“国”与“己”之关系，呈现“国民”与“国家”同构的国民国家观，尤其注意到“国权”与“人权”的统合。陈子褒强调女子作为国民之重要组成部分，应担负起国家兴亡之重任。“尔女子，亦国民。中国事，也须知。欲知事，看新闻。国衰旺，尔有份。国势弱，实可耻。教子孙，莫忘记。尔女子，宜勉之。”^⑪陈子褒不断指出国权与民权之不可分割，如在《（中华民国）妇孺三字书》中出现有“民国兴，民权立”，^⑫且指出“共和国，民有权”。^⑬

（二）从“半教立国”到“女子读书”：倡导“造就平等之智识”，明确“以学救愚”“以教育兴国”。

在古代，中国女子被拒绝在正规教育的大门之外。鸦片战争之后，王韬、李善兰、李圭、王之春、薛

①郑大华：《论国民观在清末的兴起》，孙中山基金会、澳门地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编：《孙中山与辛亥革命1911》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66页。

②文达：《澳门掌故》，澳门：澳门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17页。

③如《易·系辞下》云：“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④如《书·立政》云：“继自今立政，其勿以俭人，其惟吉士，用励相我国家。”

⑤沈长云、张渭莲：《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页。

⑥萨孟武：《政治学》，台北：三民书局，1983年，第5页。

⑦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第193页。

⑧《礼运注》，康有为撰：《康有为全集》（第五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55页。

⑨《（初次编辑）妇孺新读本》卷八，（无版权页），第11页。

⑩蒙学书塾编辑：《（初次改良）妇孺论说入门》，第22页。

⑪《改良妇孺三字书》下卷，第2页。

⑫《（中华民国）妇孺三字书五种》（下卷），（无版权页），第10页。

⑬《（绘图改良）妇孺三字书五种》初学适用上卷，上海：复兴书局印行，（无出版时间），第6页。

福成、郑观应等通过游历的亲身感受,认识到女子教育问题上关涉到国家强盛。1896年,梁启超发表《论女学》,疾呼“然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①1898年,严复翻译《天演论》,引入优生学进化论的思想,母亲这个生物学角色被赋予延续民族血统、强国保种的母体责任/重任,女子教育则与民族国家的再生产责任直接相连。陈子褒强调必须改变中国传统的“半教立国”状态,呼吁女子读书,在《劝妇读书》一课写道:“人与兽别,只在知识。知识何来,读书始得。忠孝节义,由书得力。记数写信,亦须笔墨。世言妇人,无才是德。遂使中华,半教立国。妇不读书,心孔窒塞。孔子是谁,亦未得知。如何能知,五伦款式。为人媳妇,必不称职。为人妻妾,那知四德。……风俗人心,转移可必。妇人妇人,读书亟亟。”^②

陈子褒在新式妇孺教科书中大量编入《劝妇读书》《女子读书有益论》《女子并非以无才为德论》《中国不兴女学之弊论》《女子宜读书论》《国民读书》《读书》《读书明理论》《强国莫要于开民智论》《以学救愚论》《劝学论》《写字论》《讲学有益论》《读书宜先解字论》《以教育兴国论》《中国学堂论》《立志不可不远大论》《读书须有一定时刻论》等课文,宣扬所有的国民都必须读书明理而国愈强,如《国民读书》一课写道:“凡有教化之国,其民必读书识字。教化愈盛,则读书识字之人愈多,而国愈强。……不独男子宜读书,即妇女亦宜读书,然后能以所知之理教其儿女。不独士宜读书,即农士工商亦必读书,然后能用新法以兴其业也。”^③

陈子褒从国家盛衰之角度强调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尤其关注女子存在于新时代的社会功能,如《女子宜读书论》写道:“女子之责,以相夫训子为最要。但女子不学,则不能明理,安能相夫训子哉。然则外人议我,中华以为半教之国,非无故矣。”^④陈子褒倡导女子投入到救亡图存的大潮去,成为国家民族的一分子。

(三)从“仁者爱人”到“一样亲爱”,呼吁“我国民,要相亲”,排列“爱国”“爱人”“爱己”顺序。

“仁”是中国古代一种含义广泛的道德观念,其核心指人与人之间的亲亲相爱,如“仁,亲也”(《说文》),“仁者,可以观其爱焉”(《礼记·丧服四制》),“上下相亲谓之仁”(《礼记·经解》)。《论语》言及“仁”109次,以此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但有“克己复礼为仁”“爱人为仁”“忠恕为仁”^⑤等多样解释。李泽厚认为“仁”的含义虽宽广而多变,但“孝”“悌”是“仁”的血缘基础,“亲亲尊尊”作为“仁”的标准;“礼”“仪”外在规范约束是“仁”的心理原则,使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融为一体;“亲亲之爱”则是由亲及人的人道主义,“为仁由己”“当仁不让”等则是个体责任担当及理想人格之追求。^⑥《劝相相爱》写道:“仁者爱人,孔子之制。爱人之事,无分大细。非必钱财,非必权势。贫富贵贱,皆可自励。”^⑦他明确“仁者爱人”时要事无大小、爱无等差,《爱人论》一课写道:“孝弟者,亲亲之道也。既知亲亲,当知爱人。凡世上之人,皆我同类,不独师友宜爱,即不相识之路人,亦不可无爱之之心。见有穷苦无依者,必量力以助之。见有聋哑跛瞽残疾之人,必哀矜而援之。见有不肖者,必善言以导之。虽遇外国之人,亦当敬爱,方不愧为有教化之民。孟子曰,爱人者,人恒爱之。此自然之理也。有不信孟子之言者,请一试之。”^⑧

陈子褒在新式妇孺教科书中不断呈现《相爱论》《爱人论》《人人相爱乃成世界论》《兄弟姊妹》

①《论女学》,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1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0页。

②陈子褒、卢湘父:《幼学妇孺韵语》,佛山十七间同文堂刷印,1917年,第6页。

③《妇孺新读本》卷6,明经阁藏板,1900年,第16页。

④蒙学书塾编辑:《(三次改良)妇孺论说入门》,蒙学书局发行,1902年4版,第4页。

⑤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6页。

⑥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0—23页。

⑦陈子褒、卢湘父:《幼学妇孺韵语》,第2页。

⑧《(三次改良)妇孺论说入门》,双门底福芸楼藏板,1909年重刻,第14页。

等课文,并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群”思想,明确个体存在的社会性。如在《劝相爱》一课写道:“汝看天边雁,一队同齐飞,汝看地上羊,一群不相离,汝等有朋友,相爱亦如斯,大家莫争论,见面笑嘻嘻。”^①1900年,陈子褒在《爱国三字书》中首次提出了国民之间无论男女、老幼皆要“相亲”,以求“同心”“合力”之观点,以建构全新的国民相爱观。如课文写道:“我国民,要相亲。我亲你,你亲我,无论男,无论女。无论老,无论幼。要同心,要合力。一国人,皆兄弟,皆姊妹,我同胞,宜勉哉。”^②

此外,陈子褒在民国之后,进一步强调爱国之重要性,如“欲爱己,先爱人,欲爱人,先爱国,国之大,有人民,有土地,有财产”。^③可见,陈子褒明确将爱国、爱人置于爱己之前,可见其对国民价值的追求和评价总是以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作为根本目标和重要尺度。

四、余论

教育启蒙之核心问题在于培养什么样的“人”。陈子褒强调“一国之强弱,系于人才;人才之盛衰,系于教育。……袁以为学堂不难,难在于今日兴学之教习。不难于聘教习,难于教科新书。苟无教科新书,虽聘请通人主持讲席,然课程忙迫,未能兼顾,往往明知旧法无补,而隐忍为之者,亦势之所必至也。”^④明确传统启蒙读本“非全行改革,无以激发国民之志气,濬淪国民之智慧”。^⑤他以“妇孺之仆”之实在努力编撰新式教科书,希望用教育陶铸国民思想,探寻培养现代人的崭新路径。陈子褒在新式妇孺教科书中国民新语义的引入和阐释重在建立全新的现代国家,明确指出不关心国事、不关心国家存亡的人根本无法使中国立足于世界民族国家之林,新国民的培养是国家救亡图存的基础。他对“国民”的理解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展开,即“国”(危急存亡——耻辱文化)和“民”(愚昧无知——兴学开智)。其中“国”是阐释“国民”的逻辑起点,是“民”的逻辑前提;而“民”是“国”展开的逻辑保障和必然的逻辑要求。在国运日衰,救亡图存成为根本任务的世纪之交,陈子褒的国家主义的国民观不仅是其个人想法的写照,更是整个社会心理的表达。1900年,《清议报》发表署名“伤心人”的文章,指出“国民者与国家本为一物”,强调“盖国家者,成于国民之公同心”。^⑥

陈子褒从国家的角度阐释国民,与西方近代公民或者公民身份概念存在实质性区别。在西方,公民身份指个体在民族国家中的主动或者被动的成员身份,在特定平等水平上享有的普遍性权利和义务。^⑦公民是作为国家的对立面出现的,国家负有保障和促进公民权利的义务,而陈子褒建构的国民观重点在使国民与国家具有高度的同一性,且国权高于民权。他虽然努力阐释新观念,但作为深受儒家思想且维护孔教的学者,其思想深处还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之影响,教科书中依旧可见其渗透着中国传统子民观,如《爱国歌》写道:“请皇安,祝皇寿。我皇帝,待百姓,好如子,我百姓,爱我皇,好如父。欲保国,欲保民,非我皇,总不可。”^⑧全书以“愿我皇,无灾害,愿我皇,万万岁”^⑨为结束语,蕴含“父皇”“子民”观。

虽然陈子褒对“国民”的理解与阐释有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其在中国社会重大转折时期,下

①《改良绘图妇孺五字书》,(无版权页),第8页。

②《改良妇孺三字书》下卷,第8页。

③《(中华民国)妇孺三字书五种》下卷,(无版权页),第12页。

④洗玉清:《改良教育先驱者——陈子褒先生》,璩鑫圭、童富勇编:《教育思想》,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54页。

⑤洗玉清:《改良教育先驱者——陈子褒先生》,第554页。

⑥伤心人:《论中国国民创生于今日》,《清议报》67册(12月22日),1900年,第2页。

⑦T. Janoski, *Citizenship and Civil Society: A Framework of Rights & Obligations in Liberal, Traditional, and Social Democratic Regi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8.

⑧《改良妇孺三字书》(下卷),第13页。

⑨《改良妇孺三字书》(下卷),第14页。

移教育启蒙之重心,在新式教科书中开创性地呈现从“子民”到“国民”之观念转换,这种对国民观持续性建构及其表达,彰显了教育启蒙核心文本所承载的时代特点和改革精神,尤其值得我们关注与敬重。因为这一转换不仅是一个语义转换和重新滤合的过程,而是一个新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创生的过程,折射了近代知识分子的现代国家想象,具有突破性的政治意义,打开近代教育启蒙建构“国民”观念的新论域。恰如赛亚·柏林指出,“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某种现在被称作意识形态的东西:态度、概念体系等所组成的核心模型;伟大的时代乃是一个世界死亡而另一个世界继起的时代,它的标志是核心模型的变化。”^①在康有为、梁启超、陈子褒等晚清知识分子倡导下,中国的前途都寄托在新国民的身上,围绕“国民”的论述盛行一时,如“我同胞之国民,当知一国之兴亡,其责任专在国民”,^②汲汲以求于启发国民自觉、激扬国民精神。陈子褒在新式妇孺教科书中通过对国民观的多维建构及其多样表达,更是成为照亮幽暗时空里中国女子教育的绚丽曙光,为教育启蒙现代“人”开辟了重要道路。

(责任编辑:蒋永华)

From *Zimin* to *Guomin*: Focusing on Concept Shifts and Meaning Interpretations in Chen Zibao's New-style Textbooks for Women and Children

WU Xiaou

Abstract: From 1895, Chen Zibao began to compile new-style textbooks for women and children, in which the terms *zimin* 子民 (literally people as sons), *guomin* 国民 (literally national people), *nǚ guomin* 女国民 (female national people) and *guojiazhimu* 国家之母 (literally mother of the nation) appeared successively. All these notions were intended to build a concept of *guomin* centering on the notion of *guojia* 国家 (literally nation as family). With the shift from taking *guojia* as the possession of the son of the heaven (i.e. the supreme ruler) to regarding it as the nation of people, these textbooks put emphasis on the isomorphism between *guomin* and *guojia* and on the unification of the state power and human rights. With the shift from favoring Confucianism as part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nation to advocating women's right to education, they promoted the idea of equality and proposed curing ignorance by education and revitalizing the nation by education. With the shift from favoring the benevolent gentlemen's love for the social subjects to advocating the universal love based on equality, they called for the mutual love between people as equal social members and set up the order of love an individual should cherish: i.e. from "love for his nation" to "love for his fellow people" to "love for himself". Striving to serve the country as the servants to women and children, Chen Zibao pioneered in developing and expressing a notion of *guomin*, reflecting the imagination of a modern nation embraced by the intellectuals in modern China and the process of how a new type of power relation and ideology came into being. Speaking of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embodied by the new-style textbooks, Chen's works have blazed a trail in enlightening Chinese people by education to become man in the modern sense.

Key words: Chen Zibao; new-style textbooks for women and children; *zimin*; *guomin*

About the author: WU Xiaou, PhD in education,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Teacher Education, Nj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① [英]以赛亚·柏林:《自由论(自由四论)扩充版》,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289页。

② 《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报》第1期,1901年5月10日。